

马恩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一）

二十世纪初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胡永钦 耿睿勤 袁延恒

中国人开始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些资产阶级有识之士，不满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主张变法维新，想从西方寻找一条“救国”之路。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他们的目标是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改造中国。他们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组织学会、建立书局、创办报刊、翻译出版西方书籍，介绍西欧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当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已广泛传播，影响到政治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向西方探求新思想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当中一些人在介绍当时流传于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时，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部分思想。

1899年2—5月，披着宗教外衣的英国侵略分子李提摩太，为了迎合我国当时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思潮，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构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了用中文节译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颌德著的《社会的进化》，译名为《大同学》，同年出版了单行本，文中曾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客德立于资本

者也。”又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这里的“马克思”“马客德”和“恩格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译名。就现在所知，这是在中文报刊上最早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但这不是中国人的译著。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初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他在流亡日本期间研究西学，并写过不少篇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也接触过社会主义和有关马克思学说的著作。他在一些文章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作过零碎的、片断的介绍。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1903年9—10月，他在《新民丛报》第40—43号上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中再次谈到马克思：“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1904年，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和1906年《杂答某报》中都曾提到马克思。与此同时，在日本出版的另外一些中文刊物如《浙江潮》中都出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或有关马克思学说的只言片语。

此外，在论述社会主义的一些译著中，也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著作内容。1903年3月，资产阶级改良派

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日本人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近代中国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本译著。书中有“加路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一章，它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介绍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有力之同志”，“野契陆斯（即恩格斯）与马陆科斯（马克思）相亲善，终始同其难苦”。在叙述马克思的生平时简要说明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哲学的贫困》（译作《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作《经济学之评论》）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作《英国社会劳动之状态》等著作的写作过程。对《资本论》尤为赞颂，并较详细地介绍了《资本论》的内容，说《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称《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并摘引了《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译文是：“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其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段中译文。

类似的译著还有《社会主义神髓》，对马克思学说及其著作也有较多的介绍。虽然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最先接触并在一些译著中提及过马克思及其著作和学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介绍马克思的思想。

根据现有的资料，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并摘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执信。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它的一些成员介绍过西欧社会主

义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不仅著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学说，而且直接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片断，这些介绍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比改良派多。

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刊载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署名蜚伸。其中“马尔克”（马克思）一节，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译作“非力特力嫣及尔”）的生平活动，文章介绍说：“马尔克者，名卡尔尔Karl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Tier（即特利尔）。父为辩护士”。“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Friedrich Engels（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害。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即布鲁塞尔）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接着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也提到了《资本论》。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内容。

1906年5月《民报》第4号“译丛”栏内刊载《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的译文中说：社会主义之大目的，在以土地、资本（此二者，人民生活所由产也）公诸社会”。“此其学说创自德儒卡玛Karl Marx（即卡尔·马克思）殷杰Engels（即恩格斯）二氏。近乃风靡全欧。”同年6月，朱执信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说社会主义“自马尔克（即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同一号刊载肇斋著

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译文是：“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

“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同年9月，《民报》第7号发表的梦蝶生写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也译介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的主要内容。1908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夏声》曾刊载《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文中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也作过介绍。

1907年，世界社出版的《近世六十名人》一书中，刊登了马克思1875年在英国伦敦拍摄的肖像。这是我国最早见到的马克思肖像。

在同盟会的成员中，有少数人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们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也介绍和翻译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片断。从1907年起，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刊物《天义报》陆续刊载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译文。1907年12月，在《天义报》第13、14卷上登载了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该文最后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9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刊载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全文，标题为《共产党宣言序言》。译者将马克思译作“马尔克斯”，将恩格斯译作“因格尔斯”。这是迄今查到的恩格斯著作最早的一篇完整的中译文。恩格斯的这篇序言概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产生过程和它的基本思想，因此，它的发表有助于当时人们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有个梗概了解。同时，编者在译文前加的按语中预告：“宣言全文亦由民鸣君译出，另于下册增刊号载之”。在该报第16—19卷合刊

号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和刘师培写的介绍《宣言》写作经过的序。1908年《天义报》停刊，《宣言》其他各章译文未能继续发表。除此之外，在合刊号发表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中，还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的几段摘译。

从《天义报》连续发表有关《共产党宣言》的译文情况可以看出，该报编者对于译介《共产党宣言》是有设想的。在发表《宣言》第一章译文前几个月，即1907年10月《天义报》第8—10合刊号上，就刊登了《宣言》译文“不日出版”的预告。“新刊预告”中，开列的第一篇书目就是“共和（产）党宣言……马尔克斯等著”。接着又在1908年1月发表了恩格斯1888年为《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编者在译文后面还加了一段按语，表明其意图：“共级（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此后，《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译文也发表了，编者还写了介绍《宣言》的序言。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天义报》能够有计划地译载《共产党宣言》，并配合发表恩格斯为英文版写的序言是作了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比之资产阶级改良派前进了一步，应当说最初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从他们开始的。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介绍的增多，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述和介绍也日渐增多了。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介绍和译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在国外的一些刊物上，而1911年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

也陆续开始译介马克思及其学说和直接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1911年上海《东方杂志》第6期刊登的《社会主义与政策》一文，曾经提到：“近世社会主义之开山，咸推德人楷尔·麦克（即卡尔·马克思），其《资本论》所述，意在集中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1912年5—7月，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刊物《新世界》第1、3、5、6、8期上，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连载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译为“弗勒特立克恩格尔斯”，译者施仁荣。这是在国内最早译载的恩格斯一本著作。在中文报刊中，最早提及这本著作是1907年9月《天义报》第6号《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文中说：“马尔克斯所著书有《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只是把恩格斯误为马克思。同年6月《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蜚仲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家说》，文中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全译了《宣言》中的十项纲领。还有一节专门介绍“资本论之概略”。此外，天津于1911年，由华承诤编著出版了《唯新人物考》一书，书中有“马克斯”（即马克思）一节。文章介绍说：“马格斯，德国社会学家及法学家也，法国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马氏与闻其事，后之伦敦，从事著述。千八百六十四年立‘万国工人会’（即国际工人协会）。其最著之著为《产业》（即《资本论》）。”

以上所概述的是二十世纪初叶，中文报刊上介绍和翻译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表明，当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著作，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重要著作《共产党宣言》也部分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这种介绍是很零星的，而且译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物多数在国外发行。国内也主要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流传，加之对马克思学说了解十分肤浅，译文多用文言体裁表述，又有许多错误和歪曲，所以这些译述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影响甚微。更主要的是，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处在幼年阶段，还没有本阶级的思想代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还不成熟。

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头几年里，中国的思想界处于混乱状态。当时流传着五花八门的学说流派。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有人谈论，但它的影响还很小，在整个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义思想。1915年，由陈独秀等人发起，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开展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猛烈冲击几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的陈腐观念，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弃旧求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多的发展，工人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起来。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斗争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迅速引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向往。“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时，中国才真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很快接受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在中国开始传播开来。

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李大钊。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曾接触过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并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先驱。从1918年起，李大钊通过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等多种方式，努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拓荒者。

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大量扩充了图书馆中的有关民族解放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把图书馆变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所。李大钊和一些志趣相投的人还发起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它是秘密组织，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为了迷惑敌人，把马克思译成与“马尔萨斯”相似的“马尔格士”。这个研究会培养了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

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这是一种小型报纸形式的周刊，能及时灵活地反映当时的斗争，又便于流传，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在它的前二十五期中，刊载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4月6日，即在五四运动的前夕，

《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介绍”栏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译文，约有千余字。标题是《共产党的宣言》，译者署名舍。译文的内容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同时全文译出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十项纲领。编者在译文前加的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大的意见……其要旨是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地劳动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每周评论》发表《共产党宣言》的这几段译文，突出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为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提供理论指导。

1919年2月，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有较大影响的北京《晨报》副刊进行改组，增加了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李大钊应邀参加副刊的编辑工作。同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在以后的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除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著译和马克思的生平简介之外，还刊载了马克思的原著译文。5月5日，为了纪念马克思一百零一年诞辰，转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一文。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并对后者中难懂的词句，如“社会生产”、“社会意识形态”、“社会革命”、“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等作了注释。从同年5月9日起至6月1日“马克思研究”专栏又连载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标题译为《劳动与资本》。这是该著作最早的中译文，是由食力从日文转译的。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1849年4月作为《新莱茵报》的社论以连载的形式首次发表。它的发表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德国工人中的传播。在整整七十年之后，《雇佣劳动与资

本》的中译本也以连载的形式首次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晨报》是影响较广、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因此，它的发表同样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之后，在6月2日至11月1日，近半年时间里，该报又连续译载了柯祖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是我国第一次发表介绍《资本论》的通俗性著作。考茨基的这部著作，虽然有缺点，中译文也很差，但在当时它帮助中国人了解了《资本论》的内容，扩大了《资本论》在我国的影响。除此之外，在《晨报》和其他一些报刊上，还陆续发表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生平传记材料以及其他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比如1919年4月四川《国民公报》连载了渊泉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简介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解放奋斗一生的事迹。

从上面叙述的资料可以看出，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十月革命以后的短短两年内，介绍了马克思学说及其著作的著述骤然增多了。马克思著作的完整的中译文开始出现了。这个时期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的译文，虽然有不少错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传播就推动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最后爆发了“五四”革命运动。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了。在广大青年群众中，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名字，成为最受爱戴的名字，在全国开始出现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五四”运动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仅在“五四”后的一年间，全国新出版的刊物竟达四百多种。这些社团和出版物，虽然思想倾向不同，但都或多或少介绍和宣传过某些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述也随之而日渐增多起来。

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经过“五四”运动，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前，从第6卷第1号起实行轮流担任编辑的办法，这时，李大钊为了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注意，便力图把应由他主编的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该号首刊标明出版日期是1919年5月，实际上拖至9月才与读者见面。为了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向广大读者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自己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续刊登在第6卷第5、6号上。作者开宗明义说明写作的意图：“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我们把这些零碎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接着，作者依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在介绍唯物史观的部分里，直接援引了《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共产党宣言》中的重要段落，这是作者从日文转译的，其中《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两段译文是第一次见诸于中文，这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很少被译成中文的情况下，是非常需要的。这篇文章在我国最早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诚然，介绍中还存在一些不妥和错误之处，译文也有不确切的地方，但在

当时，对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在这一号里，还有两篇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一篇是刘秉麟写的《马克思传》，另一篇是从《晨报》转载的《马克思的奋斗生涯》，简介了马克思的生平和《资本论》写作的情况。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国民》杂志也开始刊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11月发行的第2卷第1号转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全译文，译名是《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李泽彰，据许德珩回忆，译者已将《宣言》全文译完，因限于篇幅，杂志只能分期发表。在《宣言》第一章译文发表后，由于胡适的利诱和威胁，译者抽回了译稿，因此《国民》杂志没有刊载完。

1919年7月，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转载了食力译的《劳动与资本》的译文，在这以前，即这一年5月，该报还转载过北京《晨报》发表的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刘南陔的《社会党泰斗马克思之学说》，简要介绍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学说。1919年8月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中，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类似的介绍和宣传在其他的进步报刊上也相继出现，这样，在李大钊的努力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马克思的一些著作的影响在群众中扩大了。学习和信仰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分子的队伍日益壮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日益高涨，一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团体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这些革命团体，除从事革命活动之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成立了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在后来发表的成立启事中说明了发起该会的原因，其中写道：“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底同志，现在大家都感到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先务……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个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的困难，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他们旗帜鲜明，公开宣称“本会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该会自发起时十几人到后来发展到包括唐山、郑州等地工人在内的二、三百人，研究会的活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书籍少的困难，他们集资建立了一个名为“亢慕尼斋”（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音译，“斋”即书舍之意）的图书室，通过会员个人捐赠书款、分派会员外出采买等办法，积极搜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的书刊，研究会成立时，就计划至少要购备英文、德文、法文三种文字的马克思全集各一份。经过大家的努力，很快搜集了一批中文和外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单行本及有关的书刊百余种。据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提供的资料，那时研究会已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在英文书籍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陆续搜集到的中文译本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袁让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和李汉俊译的《资本论入门》、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等有关著作，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搜集这么一批数量可观的书籍供阅读研究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急于寻求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切心情，而且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当时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侧面。

研究会成立初期，为克服一些人不懂外文的困难和提供学习条件，曾组织懂外文的会员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原著。罗章龙回忆说，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研究会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我们德文组曾译过《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翻译的，有油印本”。我还记得《共产党宣言》很难译，译出的文字不易传神。所以当时翻译的进度很慢，如《宣言》的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议论说，‘幽灵’这两个字不大好，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有的同志说，直译，然后把意思作一个说明。在那时，我们认为‘幽灵’在汉语中是一个贬义词，在德文中，‘幽灵’这个词就是‘鬼怪’的意思，我们还认为‘徘徊’这个词也不好，因为没有指出方向，所以后来我们加以说明：‘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象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类似这样的说明，在译文中约有七、八处之多。《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部分译文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引用过。我们德文组还译过《资本论》第一卷，这是李大钊先生号召我们翻译的”。他们还参加编译“康慕尼斋丛书”，“列宁丛书”和“马列主义丛书”。除此之外，研究会还定期举行演讲会、学习讨论会

和设立研究组，如《共产党宣言》研究组和《资本论》研究组以及通过一些纪念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会会员一面通过各种形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使研究会成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中心，一面积极参加实际革命活动，声援工人运动并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广泛活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也为北京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

1920夏，上海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陈独秀等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接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得到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受到了重视。

1920年8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因此，它的出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译者陈望道，早在日本留学时接触过科学社会主义，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回国后又投身于进步思想的宣传活动。1919年底，经过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风潮的锻炼和启发之后，他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又应上海《星期评论》周刊的约请，根据编辑部和陈独秀提供的日文和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开始试译。《共产党宣言》。翻译是在环境险恶和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秘密进行的，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译者便躲在一间破旧的柴草棚里，

点着昏暗的油灯，克服了缺少资料和工具书等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经过百余天的苦斗，柴屋里闪烁出金色的光芝，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中译文稿终于在这里诞生了。

《共产党宣言》的译稿，原准备在《星期评论》周刊上发表，但在陈望道应约于1920年5月来上海不久，《星期评论》突然决定停刊，陈独秀等人在上海酝酿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对外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参加了这些活动，于是便把《共产党宣言》译稿交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设法出版，这件事情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重视，起先这部书找不到书局印刷，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的资助下，共产党的发起小组在上海辣斐德路（今为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牌名叫“又新”的印刷所，这样，《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才得以出版，时间是1920年8月，这个版本，目前在我国已成孤本。这个版本的开本比现在的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一点，是平装本，封面上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封面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居于马克思像的上端。封面上还有“马克思、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的署名，全书用三号字竖排，封底里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印刷及出版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和译著者及书的价格。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一经出版，立即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初版印刷只有一千本，很快赠售一空，读者纷纷投书《星期评论》编辑部询问《共产党宣言》发行情况，为此，已停刊的《星期评论》周刊编者沈玄庐不得不在上海《国民日报》同年9月30日副刊《觉悟》上刊登了题为《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的公开信。

信中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覆你们问的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二，这本书的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地译出过几本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体系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社会主义研究社又于9月出版了第二版，在不到两个月内，《共产党宣言》连续印刷两次，这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史上也是罕见的。之后，各地争相翻印，不断再版，就这样，这部光辉的著作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广泛地流传开来，马克思、恩格斯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这纲领性文献在问世七十二年后在中国出版了。当时适逢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它的出版为中国生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积极 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5月以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也都先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研究会的一部分坚定的成员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7、8月，毛泽东从北京回长沙后，为了在湖南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立即着手创办文化书社和马克思研究会。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开始学习、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创办过《湘江评论》，组织“新民学会”，宣传新

① 关于《宣言》第一次出版的时间目前尚有争议，从目前查核材料看可定为1920年8月，但仍需进一步考证。

思想，研究社会主义，探索改革中国社会的途径，并注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曾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1920年初——引者），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的文化书社，不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而是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团体，它在全省设有分社，同全国各地的许多报刊、书店和进步团体建立了联系，销售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报，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新青年丛书”中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小册子。同时，这些书刊也是马克思研究会成员的必读书籍，它们在湖南对于引导青年走向进步，走向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武汉有恽代英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也是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构，恽代英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在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翻译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内容，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即《“爱福烈特纲领”解说》等，利群书社同毛泽东办的文化书社关系最密切，同全国各地的进步团体和书局有广泛的联系，它经销《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在湖北和长江地区有较大的影响。

在天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创办了“觉悟社”和“新生社”，学习和

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还有一些进步青年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经常往来于京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回国后，投身于革命运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不顾危险在狱中向被捕的群众宣传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学说。这些活动在天津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的迅速广泛的传播，引起了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破坏，妄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扩大。1911年9月，北洋军阀段祺瑞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发出训令：

“……过激党列宁一派，注目中国，欲使投入漩涡，曾以支那语之印刷物配布于中国及中亚细亚等情，自应严密查禁……”1920年北洋政府又查扣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刊达八十三种之多，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更有甚者，反动统治阶级因害怕马克思学说的流传，竟发了一道“内阁令”，叫警察厅严查出版物，遇有马克思的书籍，就要没收。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封锁、查禁，而且也遭到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攻击、歪曲和敌视，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反动势力是阻挡不住的。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批驳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自1920年5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先进最革命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时，除革命团体和进步报刊译载和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

官》外，一些有进步要求的报刊也陆续刊登马克思的著作译文或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译著，如1920年10月，在已经转向进步的《国民》杂志10月号里，发表了费觉天翻译的题为《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全文。在同一号里，还发表了常乃惠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引用了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写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的有关论述。还有一些书局和报刊，或迫于形势，为时代潮流所驱使；或为取悦于读者，打开销路，也刊登一些反映新思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甚至译介和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译文片断、小册子。

1920年8日，上海群益书社和伊文思图书公司联合出版了由郑次川编译、王岫庐（王云五）校订的《科学社会主义》小册子，这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的第三章节译，恩格斯的著作在我国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尚属首次。1920年10月，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第17、19—20卷连载了恽代英摘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中关于家庭起源的部分内容，当时的标题是《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恽代英在“译者志”中介绍作者时称“英哲尔士为马克思的挚友”。1921年1月，该杂志在第18卷第1号中，又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题，以中文和德文对照的形式，分为五个段落刊登了范寿康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物史观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刊物《建设》，1920年第2卷第6号和第3卷第1号上分别以《见于资本论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为题，发表了徐苏中从日文转译的两篇介绍文章，前一篇中摘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多处，后一篇则是由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篇第二章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的最后结论部分编译而成的。这些译述大都比较粗糙、错误也较多，但客观上对于中国人了解马克思学说的部分内容也起了些作用。

此外在一些报刊上，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论评》等，都陆续刊载和出版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传记方面的著述。如1920年9月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了马尔西著、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晨报》上连载以后，1919年11月至1920年1月又在《建设》杂志上以《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为题发表了另一种译文。1920年9月，共学社又作为“马克思研究丛书”第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书名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同时，恽代英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李季译的刻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也都相继出版，《星期评论》在1920年的新年号上转载了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的回忆片断等。

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一批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一面在知识分子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又面向工人群众通过开办工人夜校、创办通俗刊物，如北京的《劳动者》，上海的《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山东、武汉的《劳动周刊》等方式，向工人讲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阐述“劳工神圣”的意义，启发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同时，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从而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开展。这样，马克思主义就逐步走上了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总之，从1920年5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传播比之以前又前进了一步。这一时期在各地报刊上刊载的以及单独出版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译文，目前已经发现的共有七种（一篇著作的不同译文以一种计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的信》等。其

中单行本两种，其余均在报刊上发表。除《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为全译文外，其余都是节译。这些译述对当时渴望学习和了解马克思学说的进步青年，以及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起了积极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未完待续）



1983年3月14日北京图书馆与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联合举办《马克思生平事业展览》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图为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艾伯特基金会副会长屈恩和夫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修德和夫人在参观展览。